

论《时时刻刻》中的女性意象

于子焯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摘 要： 电影《时时刻刻》由史蒂芬·戴德利执导，改编自当代作家迈克尔·坎宁安的同名小说。迈克尔·坎宁安以弗吉尼亚·伍尔夫《达洛维夫人》为蓝本创作的《时时刻刻》，通过女性主义叙事揭示了意识觉醒的渐进性。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影片中水与花的意象分析，而对蛋糕、鸟、药等元素的女性主义解读尚显不足。本研究通过对意象的深入剖析，揭示女性角色在男权社会中的生存困境与自我觉醒。同时提出克拉丽萨·沃甘看似自主的“买花”行为实为性别孤僻的隐喻，围绕女性死亡、身份解构及伦理困境展开分析，阐明女性价值实现的多元路径。

关 键 词： 《时时刻刻》；电影符号；女性意象

On the Female Image in "The Hours"

Yu Zihan

Faculty of Arts,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1

Abstract： The film "The Hours" is directed by Stephen Daldry, adapted from contemporary author Michael Cunningham's novel of the same name. Based on Virginia Woolf's Mrs. Dalloway, Michael Cunningham's The Hours reveals the progressive nature of consciousness awakening through feminist narration. Most of the existing studies focus on the image analysis of water and flowers in the film, but the feminist interpretation of cake, bird, medicine and other elements is still insufficient. Through the in-depth analysis of images, this study reveals the survival dilemma and self-awakening of female roles in the male-dominated society. At the same time, Clarissa Vogan's seemingly autonomous behavior of "buying flowers" is actually a metaphor for gender isolation, and analyzes women's death, identity deconstruction and ethical dilemma to clarify the multiple paths for realizing women's value.

Keywords： "The Hours"; movie symbol; female image

作为具有鲜明意识流叙事特征的经典影片，《时时刻刻》（The Hours）巧妙地以弗吉尼亚·伍尔夫 1925 年创作的文学名著《达洛维夫人》（Mrs.Dalloway）为叙事锚点，通过精妙的蒙太奇剪辑手法，将跨越时空的三位女性的人生轨迹交织呈现。影片在展现女性生存图景的同时，深刻融入了对性别政治、性少数群体、婚姻制度、生命价值等现代性议题的哲学思辨。而电影里反复出现的意象增添了电影女性主义内涵。“花、蛋糕、鸟、药”等元素被巧妙地运用，在表达女性意识方面蕴含着丰富象征意义。

一、花——性别自主的隐性障碍

伍尔夫笔下的“我要自己去买花”成为贯穿影片的精神线索。在劳拉·布朗的情节中，丈夫的“体贴”剥夺了她购花的权利，暗示传统婚姻对女性主体性的消解。表面上，克拉丽萨·沃甘的自主购花彰显现代女性的独立，但其情感依附于同性伴侣、患病前男友与女儿间的多重关系，暴露了性别身份的割裂性。她的“自由”仅停留在行为层面，内核仍困于社会规训的牢笼，折射出女性解放的复杂性。

《达洛维夫人》中的那句话：我要自己去买花。自己买花有什么了不起的呢？但是弗吉妮娅·伍尔夫被医生禁令出门，无法自己买花。女人之所以爱花，或许也在于她们感觉与花同病相怜的无奈^[1]。同时，花也具有短暂而易逝的特性，暗示着女性的脆弱

和易受伤害的一面。

在丈夫生日时，丈夫提前购置了鲜花，并以“需要多休息”为由限制劳拉·布朗的行动。这种看似体贴的安排，实则将她禁锢于“完美主妇”的既定角色。从挑选鲜花等生活琐事到日常作息的全面掌控，温柔的表象下父权制规训已经消解了女性主体性。“对象被当作我们自己的某种未能达到的自我典范的化身。我们爱它是因为它具有那种我们自己的自我所力求达到的完善性。现在我们打算通过曲折的方式把它作为一种满足我们的自恋性的手段。”^[2]当劳拉意识到自己连“为丈夫庆生”这一行为都沦为被操控的表演时，她的内心深处涌起了从顺从到质疑的心理蜕变。这种存在主义困境催生了最初的觉醒意识，促使她开始萌生出突破既定命运轨迹的潜意识冲动。

克拉丽萨·沃甘却可以自主买花，对她来说买花只是一件小

事。但是在这看似自主性下，她却依旧逃不掉生长在性别壁垒上的孤僻。克拉丽萨·沃甘是一位职业女编辑，有同性恋女伴、一个女儿，又照顾着患有艾滋病的前男友。但后面可以看出，她的生活看似繁杂，但其实剥去复杂的人物关系，她的内心却极度的不安与孤独。她并未处理好同性和异性前男友的边界，甚至反复徘徊于这个边界的两侧，无法割舍任何一方，这是两性的平等对立，并不是哪一方的优越压倒了另一方，而是平等地困扰了克拉丽萨·沃甘。她并没有做到完全的独立和解放，反而是常常困在伴侣性别的选择，她的自主也就仅仅是买花这一行为的自主，并非女性人格的自主。

在伍尔夫的时代，女性被禁锢于家庭空间，买花这一行为被剥夺，实则是对女性身体自主权的剥夺。各色鲜花提示人物中产阶级的生活地位，暗喻人物的个性，象征女性永远为他人忙碌的状态^[9]。劳拉的遭遇延续了这一困境，而克拉丽萨虽然获得了买花的自由，却陷入了更深的性别认同焦虑。这种“自由”背后的代价，反映了后现代社会中女性解放的复杂性。

二、蛋糕——女性价值的消亡

蛋糕是一种奢华甜蜜的符号，频繁出现在影片中男女主角共享的温馨场景里。然而，蛋糕也暗示着一种虚幻和不真实的美好。

劳拉·布朗送走丈夫，她脸上的笑容随即消失。劳拉陷入了存在主义式的生存困境。无论是丈夫在家的日常还是独处的时光，她都敏锐地捕捉到生命本质的虚无——这种虚无感既不因伴侣的在场而消解，也不因短暂的独处而缓解。为了对抗这种存在的荒诞性，她只能通过机械性的家务劳动填补存在的虚空，却在重复的动作中更深刻地体会到自我价值的消解。

凯特推门而入，看到劳拉精心准备的生日蛋糕不达预期。“这有什么难的？谁都能烤出像样的蛋糕。”凯特随后补充道：“你有多少优点，丹又那么爱你。”这段看似安慰的话语颇有深意：在传统性别叙事中，烘焙是衡量女性价值的标尺。凯特的质疑本质上是维护“完美主妇”神话——蛋糕的失败被隐喻性地等同于女性特质的缺失。电影中的日常对话强化了女性价值评判机制，折射出一种无形却强大的规训力量，促进实现女性的自救和真正意义上的“灵魂触动”“精神对话”^[10]。

当凯特注意到桌上的《达洛维夫人》时，她询问了这本书的主题。劳拉的回答充满隐喻：“讲述一个自认为完美的家庭主妇筹备派对的故事，她的自信蒙蔽了所有人，除了她自己。”这段对话构成了深刻的互文隐喻——两位女性在不同维度上重复着达洛维夫人的悲剧：凯特宣称“能完成任何事”，却在生育困境前遭遇主体性坍塌；劳拉拥有世俗意义上的美满家庭，却在蛋糕制作失败中体验到存在性焦虑。这种叙事嵌套揭示了父权制社会对女性价值的双重规训：既能胜任传统家庭角色（如烘焙），又能突破性别桎梏实现自我价值。当蛋糕从家庭仪式的载体升华为现代女性生存困境的隐喻时，它已超越个体经验，成为女性群体在多重社会期待中自我撕裂的象征。

三、鸟——从黛玉葬花式的女性自怜到困境突破

电影中的女性角色可能经历了类似于《红楼梦》中黛玉葬花的情感自怜阶段。《红楼梦》中林黛玉诗意的诉说，既是对生存环境的控诉，也是对春归花谢、人命无常的喟叹^[11]。而《时时刻刻》则以现代视角重新审视了这一主题。电影中的女性角色可能也经历了类似的自怜阶段。这种情感自怜可能是她们对社会期待和自身价值观之间冲突的反映，也是她们对未来前途的担忧和不安所致。黑格尔曾表示，两性应该不同，一个是主动的，另一个是被动的，当然，被动性是属于雌性的^[12]。

在阴霾的天空下，伍尔夫表姐的幼子捧着一只羽翼凌乱的濒死生灵，试图用孩童的纯真延缓生命的消逝。表姐的声音带着宿命般的冷静：“有些生命的轨迹是无法改变的。”话音未落，镜头悄然转向伫立在远处的弗吉尼亚，潮湿的泥土气息中，视觉隐喻呼之欲出——这只即将逝去的母鸟，恰似被男权社会禁锢的女性灵魂。当弗吉尼亚与小侄女共同完成这场生命的送别仪式时，孩童稚嫩的声音穿透薄雾：“它那么小。”这句天真的喟叹，实则是对存在主义困境的深刻注解：当个体在社会规训中逐渐丧失主体性，生命的重量便会在死亡面前显露出惊人的轻盈。这种对生命终极形态的凝视，既是伍尔夫对自身命运的预演，也是对所有被压迫女性的精神献祭。

她看向的不仅是鸟，也是自己，更是女性的代表。伍尔夫埋葬垂死鸟的场景与黛玉葬花形成跨时空呼应。鸟的“渺小”暗喻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边缘化，而埋葬仪式是生命意义的哲学叩问。伍尔夫凝视死鸟时，她并非哀叹宿命，而是以疯癫为武器对抗世俗束缚。当她俯身凝视那具冰冷的禽鸟尸体时，静默的凝视仪式中蕴含着深刻的存在主义叩问——在主体性被消解的生存困境中，死亡是否意味着精神桎梏的终极解脱？人鸟对视的超现实画面，将这种对生命终极意义的哲学思辨华为对所有被压迫者精神出路的隐喻性探索。只有按伍尔夫所说的那样去做，文学妇女才能破除父权制文学传统的束缚，还妇女形象的本来面目，让妇女作为活生生的、多姿多彩的、独立的、具有自我和自主意识的人存在^[13]。

鸟的意象从自怜载体升华为反抗符号：死亡不是终点，而是打破枷锁、重构主体的起点。这种“向死而生”的勇气，为女性突破生存困境提供了精神出口。

四、药——打破枯燥生活、追女性自由的旗帜

劳拉摆在宾馆的药和理查德停止吃下的“救命药”，标志着死亡不是终点，而是人类追求自由反对束缚的旗帜。死亡不是被迫降临，而是与生存对比后的选择，是对“活多久”到“怎样活”的反思与重构。

这两者有一个共同点：在存在主义视域下，对庸常生活的本能抗拒始终处于未被激活的潜在状态。福柯把现代社会视为一座“巨型的监狱”，一架控制身体的“规训机器”^[14]。缺乏外部触发机制时，主体陷入“规训社会”的隐性压抑——既意识到生命的

荒诞本质，又因社会规训的内化而主动维持现状。而药这个意象恰恰就是对打破生活平静的一个诠释。劳拉想服用药物来结束枯燥的生活，理查德想停止服用药物来停止无意义的平庸。劳拉主动解构传统家庭角色，这在当代社会语境中仍被视为突破道德共识的惊世之举。女性试图突破“贤妻良母”的既定脚本，其行为往往被置于道德审判的聚光灯下，而背后的主体性诉求却常被集体无意识遮蔽。从女性主义立场出发，这种选择实则是主体意识觉醒的表现，标志着个体开始挣脱社会规训的枷锁，探寻自我实现的新路径。

劳拉的抉择可视为主体意识觉醒的典型范式。女性的认知方式则是整体、诗意的，注重对世界精神层面的关怀，相信现实的点滴终能汇成永恒的整体^[9]。当她直面内心真实诉求时，无论是选择终结生命还是继续生存，本质上都是对本真自我的执着追寻。这种存在主义式的生命实践，突破了传统性别角色的规训框架，在死亡与生存的二元命题中完成了对自我价值的重新建构——死亡不再是消极的逃避，而是主体对异化生存状态的终极反抗；生存也不再是被动的延续，而是带着创伤记忆继续解构性别权力秩序的漫长征程。

劳拉的药物象征着对现实的逃避，而理查德的停药则是对生命尊严的追求。两者看似相反，实则都是对“活着”这一状态的反思。这种对生命意义的追问，超越了性别界限，指向了人类共

同的存在困境。“主体将客体刺激纳入自身认知结构之内以扩展知识，然后才做出对客体的反应”^[10]。劳拉试图以自杀逃离家庭桎梏，理查德通过停药拒绝被拯救的“他者”身份。药具有双重性，它既是压抑的帮凶，亦是觉醒的催化剂。影片借药物暗示：真正的解放不在于生理存活，而在于对“如何存在”的主动选择。

五、结语

《时时刻刻》中的象征元素，反映了女性角色内心世界的复杂和多变。花、蛋糕、鸟、药等意象构建的隐喻系统，不仅深化了女性主义主题的表达维度，更以诗性的审美语言为文本注入了神秘主义。这种艺术处理使影片在探讨女性生存困境、性别权力解构以及伦理关怀等严肃命题时，成功实现了哲学思辨与艺术表达的交融。

笔者在讨论了以前较少涉及的蛋糕、鸟和药的基础上补充了“克拉丽萨·沃甘可以自己买花却也体现了她在性别壁垒上的孤僻”这一观点。克拉丽萨的“买花自由”暗含孤僻性，劳拉的蛋糕隐喻价值消解，伍尔夫的葬鸟指向生死辩证，而药物则揭露生存的伦理悖论。这些意象共同构建了一个充满张力的隐喻系统，使影片超越个体叙事，成为对女性集体命运的诗意叩问。

参考文献

- [1] 刘须明, 郭束怡. 《时时刻刻》: 由小说到电影的艺术转换 [J]. 艺术百家, 2012, 28(03): 189-192.
- [2] [奥]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自我与本能》, 张唤民、陈伟奇、林生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年, 第148页.
- [3] 吕荷英. 《时时刻刻》与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 [J]. 电影艺术, 2003, (04): 119-122.
- [4] 金丹元、曹琼: 《女性主义、女性电影抑或是女性意识——重识当下中国电影中所涉及的几个女性话题》, 《社会科学》2007年第12期, 第173页.
- [5] 李英然. 黛玉葬花: 《红楼梦》诗意叙事的深度开掘 [J]. 红楼梦学刊, 2012, (01): 28-43.
- [6] [法] 西蒙娜·德·波伏娃著, 郑克鲁译: 《第二性》[M],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年版, 第33页
- [7] 程锡麟. 天使与魔鬼——谈《阁楼上的疯女人》[J]. 外国文学, 2001, (01): 72-78.
- [8] 汪民安. 权力 [J]. 外国文学, 2002, (02): 81-89. DOI: 10.16430/j.cnki.fl.2002.02.013.
- [9] 李娟. 转喻与隐喻——吴尔夫的叙述语言和两性共存意识 [J]. 外国文学评论, 2004, (01): 17-24.
- [10] [瑞士] 皮亚杰. 皮亚杰学说及其发展 [M]. 陈孝禅, 译.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3: 21.